

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

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

宋家钰 刘忠 编

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

87
9
29

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

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

宋家钰 刘忠◎ 编

26.3287
S769
00367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03672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宋家钰,刘忠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6

ISBN 7-5004-2762-X

I. 英… I. ①宋… ②刘… II. 敦煌学-文献-研究 IV.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057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100720)

新魏印刷厂印刷 三河市达文装订厂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7 插页:2

字数:582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72.00 元

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2240/3

目 录

第一编 敦煌文献发现百年的回顾与展望

祝贺与希望·····	季羨林 (3)
百年感怀·····	周一良 (5)
中国学者在敦煌文献编目上的贡献·····	周绍良 (8)
敦煌文献与中国历史研究·····	宁可 (15)
敦煌学发展历程有感·····	沙 知 (19)
敦煌学的过去与未来·····	柴剑虹 (24)

第二编 敦煌文献在英国的收藏与编目

上篇 敦煌汉文文献·····	郭 锋 (41)
第一章 斯坦因敦煌文献的掠取·····	(41)
第二章 文献的收藏、保存与修复·····	(44)
一 初藏与分藏·····	(44)
二 保存与修复·····	(45)
第三章 文献的整理、编目与刊布·····	(48)
一 文献的整理与编号·····	(48)
二 文献的编目与刊布·····	(53)
下篇 敦煌藏文文献·····	刘 忠 (68)
第四章 斯坦因对吐蕃文物的劫取和编目·····	(68)
一 罗布地区吐蕃文物的“丰收”·····	(69)
二 敦煌文物的骗取者·····	(69)
三 吐蕃文物的分配与保管·····	(71)
四 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刊布和传入中国·····	(72)
五 斯坦因的主要著作·····	(73)
第五章 普散对英藏藏文文献的编目和定名·····	(74)
一 普散编目的若干特点·····	(74)
二 普散的分类和初步定名·····	(75)
三 写本形状的分类·····	(77)

第六章 日本学者对定名的贡献	(79)
一 榎一雄辨认藏文写本的汉文佛经	(79)
二 山口瑞凤主持的定名工作	(80)
三 新编目和新定名	(84)
第七章 托玛斯对英藏西域藏文文献的编译和研究	(88)
一 重头著作	(88)
二 托氏著作与普散著作的合分	(89)
三 编号上的特殊处理	(90)
四 其他方面的学术成果	(91)

第三编 英国收藏敦煌文献叙录

上篇 汉文文献	(97)
一 S. 1441 等: 敦煌本《斋文》书复原全文	宋家钰 (97)
庆杨(扬)文第一, 赞功德文第二, 禳灾文第三, 患文第四, 亡文第五, 诸 杂篇(文)第六, 诸色篇(文)第七	
二 S. 1725 等: S. 1725 与 P. 4024 写本书仪丧服部分录文及 校释	吴丽娱 (113)
三 S. 2614 等: 石谷风藏《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残卷读 后记	沙 知 (123)
四 S. 2713: 《普劝事佛文》浅议	杨宝玉 (127)
五 《英藏敦煌文献》第五卷叙录	张 弓 (129)
S. 3074: 高僧传略; S. 3392: 骑都尉秦元告身; S. 3395v: 庄子郭象注摘抄; S. 3457: 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 S. 3663: 文选卷第九; S. 3702v: 杂缘喻因 由记; S. 3724v: 六十甲子纳音、六十甲子纳音性行法、李老君周易十二钱卜 法、郎君立身诗、推九天行年灾厄法; S. 3728: 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等; S. 3824v: “正月七, 日南交”曲子; S. 3877v: 下女夫词一本	
六 《英藏敦煌文献》第六卷叙录	张 弓 (145)
S. 3929v: 董保德等建造兰若功德记; S. 4276: 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安怀恩并 管内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奏请表; S. 4307: 新集严父教一本; S. 4359v: 奉送 盈尚书诗三首; S. 4362: 肃沙都头宋富宏家书; S. 4374: 分书文样; S. 4413: 二月八日文; S. 4430: 道德经顾欢注; S. 4433v: 医方; S. 4444v: 诗二首; S. 4445: 何愿德贷褐契; S. 4459v: 常乐押衙王留子乞司空矜免积欠羊毛状; S. 4612: 大唐三藏圣教序 大唐皇帝述圣记; S. 4622v: 状文三通; S. 4652v: 祈灵蝗莫食嘉谷愿文; S. 4654v: 赠悟真等法师诗抄; S. 4663: 杂抄一卷; S. 4685: 沙州李丑儿与弟李奴子家书; S. 4711v: 为于阗云游僧法因求住三界 寺禅院状; S. 4860v: 当坊义邑创置伽蓝功德记并序	
七 S. 4037: 佛家灵验记校议	杨宝玉 (162)
八 S. 5381v: 《日落西山昏》曲子与遗书文样	宋家钰 (164)

九	S. 5632: 敦煌贷绢契与量绢尺	宋家钰 (166)
十	S. 6036: 《贫女因子落蕃设供斋僧感应记》校理	杨宝玉 (170)
十一	S. 6235v: 大中六年 (852) 十一月百姓唐君盈手实	宋家钰 (172)
十二	S. 6424v: 《请宾头卢波罗堕和尚疏》拼合与校议	杨宝玉 (177)
十三	Ch. 00144 等: 英藏敦煌文献二件释录	沙 知 (179)
下篇 藏文文献 托玛斯《关于中国西域藏文文献与写本》		刘 忠 (183)
一	与吐谷浑有关的藏文文书	(184)
二	与沙州有关的藏文文书	(187)
三	有关罗布地区的藏文文书	(195)
四	有关于阆地区的藏文文书	(199)
五	关于突厥的西域吐蕃文书	(207)
六	有关政府和社会情况的藏文文书 (上)	(211)
七	有关政府和社会情况的藏文文书 (下)	(217)
八	有关吐蕃军队的藏文文书	(223)

第四编 英藏敦煌文献研究

一	略论 S. 613 背敦煌文书载西魏大统十三年七户纳税制	王永兴 (233)
二	S. 964v 号文书与唐代兵士的春冬衣	黄正建 (237)
三	S. 11287 唐睿宗教书试释	宋家钰 (252)
四	敦煌文学丛考	周绍良 (258)
五	唐代书仪中单、复书形式简析	吴丽娱 (263)
六	敦煌 S. 1725 与 P. 4024 写本书仪的撰成年代与贞观丧服礼	吴丽娱 (282)
七	佛教斋文源流与敦煌本《斋文》书的复原	宋家钰 (295)
八	佛家灵验记与《智兴判》	杨宝玉 (320)
九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校考	杨宝玉 (328)
十	敦煌汉文针灸图俞穴名称部位考	马继兴 (339)
十一	敦煌残卷中的《内经》古诊法佚文及其复原	马继兴 (360)
十二	敦煌本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辨脉法》残文出处考	马继兴 (363)
十三	英藏敦煌文献年代丛考	郝春文 (369)
十四	《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补正	荣新江 (379)
十五	部分英藏敦煌文献的定名问题	郝春文 (388)
十六	《英藏敦煌文献》(1—8) 补遗	许建平 (392)
十七	敦煌藏文文书祈愿文译考——斯坦因编号 35—41 号	刘 忠 (396)
十八	敦煌阿骨萨部落一区编员表诸家译文剖析——向藤枝晃、姜伯勤诸先生质疑	刘 忠 (408)
编后记		(425)

第一编

敦煌文献发现百年的 回顾与展望

祝贺与希望

季羨林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道：“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真是一语破的，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陈先生引用某学者的这句话，是完全有根据的。他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选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校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藉末由也。”

陈先生这篇文章写于1930年，他对当时中国敦煌学之所以薄弱之原因，论述具体而求实，用不着再作什么解释与论证。我只想补充一点：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到1930年，30年中，中国政局极端混乱，改朝换代，军阀混战，中国学者哪里有余裕，有财力和精力，来“预流”呢？仅有三数人的著作能进入学术之林，已不算少。我们今天要真诚地感谢这三数位学者，他们给中国争得了荣誉。

从1930年以后，中国政局又连续不断地动荡不安。日寇侵华，更是火上加油。好不容易盼来了解放，在敦煌文献整理和编目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然而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有时难于安心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年纪老的，几乎一古脑儿赶入封、资、修的队伍中，把中国从没有的，从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借来的“原罪”感硬移栽在你的心中。天天批修，时时斗私，哪里有余暇来研究学问。而且敦煌那一些经卷都属于四旧范畴，是铲除的对象，而决不是研究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欲求中国学者对国际显学敦煌学做出很大贡献，是不大可能的。

从1930年算起，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的老、中、青敦煌学者组建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全国和全世界耳目为之一新。从那以后，我们的队伍壮大了，学术成果增多了，研究水平提高了，国内外的观感改变了，这一切都引起外国学者瞩目。我们的学者完全能赶得上世界的新潮流，我们“具通识”的人越来越多，同英、法、俄等国的合作越来越多，他们邀请我们去帮助他们整理、编纂敦煌卷子。在中国，敦煌学的春天已经到来，我焉得不诚挚地祝贺呢？

但是，学无止境，古有明训。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外国同行学习。一个新的世纪转瞬即至。值此万象更新之日，我们中国从事敦煌学研究

的学者们，千万不要过早地自满，应当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焚膏继晷，努力工作。国内的学者们要团结互助，对国外的学者也要以诚相待。行将见“伤心史”一变而为“赏心史”，这就是我的希望。

1998年9月18日

百年感怀

周一良

欣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0 年将出版《英藏敦煌文献研究》一书，而 2000 年又恰恰是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回顾这一百年来敦煌文献的历史，不禁感慨系之。陈寅恪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引一位学者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当时确实如此。但是现在回顾这一百年来的发展，我们觉得，到一百年后的今天，敦煌研究已经由“伤心史”，变为一部令人欢欣鼓舞的学术史了。

1900 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在清朝腐朽政府的统治之下，当时敦煌文献的发现没有受到任何重视。中央政府既没有加以保护，而地方政府又随意任听帝国主义分子来掠夺抢劫，以致这些宝贵的材料流落分散到世界各地。清政府虽然最后把少数剩余的 8000 卷运到北京，但是依然没有很好地加以保管利用，反而被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像李盛铎、他的同乡刘廷琛，以及他的朋友方地山等人，肆意盗窃。他们把敦煌卷子里的一些精品都据为己有。据说方地山先生直到 30 年代，每当生活穷困的时候，就把他所藏的精写本的敦煌写经拿出来割截几尺去卖钱，来维持生活。相反，帝国主义把抢劫去的敦煌卷子很好地加以保存珍藏，始终没有再散失，一直到今天。

自从 1909 年伯希和把少数敦煌卷子带到北京，给中国学者看到以后，中国的学者就不断地有人到西方去调查这些卷子，并企图加以利用。但也只是个别人。直到 30 年代，才有北京图书馆的袁同礼馆长，委派了向达、王重民两位先生到巴黎和伦敦比较系统地搜罗、复制敦煌文献，带回中国。他们的整理与研究，给中国的敦煌学打下了基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期间，继续有不少中国学人到巴黎和伦敦去，利用这些敦煌文献做出了不少成绩，但究竟仍限于个别方面。

而从 20 年代以后，经济非常发达的日本情况却不一样，他们大量的学者到西方去，有足够财力可以比较自由地阅读西方所藏的敦煌文献；同时，还比较系统地、大规模地把这些材料归纳、整理，结集成为很有用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等，还出版了多卷本的《敦煌讲座》。于是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却不在中国”。这个话，当时看来有它一定的道理。

四五十年代以后，情况开始有所转变。从材料本身说，50 年代以后我国就出现了《敦煌变文汇录》、《敦煌变文集》和包含社会经济史料的《敦煌资料》。50 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和中国香港的学者，都积极从事敦煌文献的研究。

大陆改革开放的 20 年，更有长足的进步。拿日本来说，长期只有英藏的敦煌文献照片。而我们在近 20 年中，法藏、德藏、英藏以至俄藏的全部胶片，再加上私人藏的

和国家藏的敦煌文献，都有了结集，等于说把世界敦煌文献的几个大的中心，都集中在北京了。其次是利用敦煌资料研究唐代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财政、社会、法制、宗教、文学、语言、历法、医药等等各个方面。敦煌资料大大丰富和加深了中国学者对唐史的认识和理解。关于敦煌地区本身的研究，也有了开展，如敦煌地区的官制、历史、地理、民族关系等等。像归义军的历史，中国学者就做出了更加缜密的研究，使日本学者的著作不能专美于前了。

敦煌发现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文书，像户籍、计帐、入破历、社司转帖、寺户等等，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敦煌发现的文学资料也很丰富，5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对于变文的校勘和解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敦煌变文的研究一时成为显学，达到了新的水平。近年出版的140万字的《敦煌变文校注》更是极大的工程。《秦妇吟》、《王梵志诗》是敦煌发现的文学作品中特别重要的，中国学人对它们研究的细致入微，是任何国家的学者都不能望其项背的。此外，敦煌发现的诗、赋和韵书，也都受到重视。中国学者还编有敦煌文献语词的词典，是研究敦煌文献必不可少的参考书，这也是世界各国所无的。有一些过去未被注意到的文献，例如书仪、斋琬文，其研究也都提到日程上来。过去中国学人对非汉文的文献没有多大发言权，而现在，不但西藏文献，像佉卢文、于阗文等，中国学人都能从事识读和研究了。由于见闻开阔，所以法藏敦煌文献的残叶，竟然在俄藏的文献中发现了它的另一半。中国学者的缀合工作也有很大进展。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敦煌研究蓬勃发展，从事于此的学人与日俱增，成就百花齐放，足以长自己的志气，一扫前辈学人的“伤心史”的慨叹。虽然我们对敦煌资料不能“收复失地”，使它们回归祖国，但研究成就则后来居上，足为弥补。我们可以不愧对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了。

回顾百年以来中国敦煌研究的进展情况，我们不由得想到，政治的清明、经济的发达、社会的稳定，是学术研究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话，学术研究就很难进展。敦煌学研究就是一个例子。这就说明，“科教兴国”固然是今天很重要的战略口号，但是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到，国家的兴衰、政治的清明与否、经济的发达与否、社会的稳定与否，对于学术的研究、文化的发展，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傅斯年先生说过，史学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于是有所谓“史料即史学”的说法。这个说法长期以来遭到很多批评，但是我觉得，这是没有正确理解它的缘故。“史料即史学”就是说，史学必须倚仗史料，必须建筑在史料基础上，才能明白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历史没了史料，一味放空炮，是没有用的，是不成其为史学的。敦煌的材料就说明了问题。唐史的研究由于敦煌资料的发现和利用，才更加深入、丰富起来。

北大历史系过去有三个专业——中国史专业、世界史专业和考古专业。我长期以来就感觉到，考古专业的同学毕业以后，成长得比较快，他们毕业后不太久就能独立工作、搞研究、写文章；而中国史专业就差一些。原因何在呢？我想，这是因为考古专业的同学从做学生时起，就比较广泛地接触考古材料，毕业时又亲自发掘，毕业以

后又不断地接触一些考古材料；因为接触实际材料，他们才能很快地形成看法，写出文章，做出研究成果。而中国史方面呢？往往只是看一些前人的著作、论文，很少接触原始材料，因为不接触材料，自然而然就受到很大的限制。世界史专业就更是如此了。敦煌史料的发现，大大丰富和加深了唐史的研究，这个事情也正好说明了“史料即史学”的真实意义。

（口授稿，1998年10月9日，阎步克笔录。）

中国学者在敦煌文献编目上的贡献

周绍良

敦煌学的研究,大致是从20世纪10年代研究敦煌遗书开始的。大约从30年代初前后,研究的内涵逐步扩展。80年代以来更加迅猛扩展。至今,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和范围大致是:

一、广义的敦煌遗书。

二、今敦煌研究院所属的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水峡口、五个庙等石窟(总称敦煌石窟)的壁画、塑像、题记、碑刻、建筑和保护等。

三、敦煌汉简,这是敦煌、玉门、酒泉三地汉代敦煌、酒泉二郡烽燧遗址出土简牍的总称。

四、古敦煌郡历史、地理、考古发现的遗址和墓葬等地面地下文物资料。

五、对以上四类材料,和对敦煌研究院现在管辖的各石窟的诸方面进行研究的文献,其中重要的和常被称引的,是20世纪初以来的各种中外文文献资料。

也就是说,对以上从一至四这四部分本身,和对这四部分进行的研究(也就是上述的第五部分),构成了当代敦煌学的主要内涵。因此,可以给敦煌学下一个如下的定义: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地区遗存的古代文物与文献的学科。

但是,应该说明的是,严格地说,敦煌学本身并非可以从科学分类的角度界定的一种“学”,却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学术领域来对上述四部分文献进行研究的“学”。因此,在敦煌学中逐渐衍生出多种专科性的“学”。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以及敦煌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受到举世注目,研究者越来越多,研究面越来越大,敦煌学中的专科性质的学科会越来越多。越是如此发展下去,敦煌学就越来越不是科学分类意义上的“学”。因此,可以进一步再给敦煌学下一个定义:敦煌学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不同学科为手段,来对敦煌地区遗存的古代文物与文献进行研究的一门学术。

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工作,从发表的成果来看,以汉文目录、遗书整理及其内涵研究、洞窟与窟内壁画等内涵的登录并研究为最显著。本文主要涉及对前两项工作内容的观察。从整理和发表的时间来看,可以将它分为比较明显的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0—20年代,是为发轫期。

第二个阶段,30—40年代,代表作是《敦煌劫余录》。

第三个阶段,50年代到60年代中,代表作是《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第四个阶段,70—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是我国各馆的馆藏目录与馆

藏补充目录争相发表的百花齐放时期，也是敦煌学目录本身的扩展期。敦煌学目录的工作一方面向文物目录等领域扩展，另一方面则向多语种扩展。遗书方面，则有大量的整理成果与研究论文发表。

第五个阶段，90年代，配合多个馆藏卷子影印公开发表，为之服务的目录、索引及提要之类的工作提上日程。对敦煌学目录本身的研究也有进展。在这样的大好条件下，对遗书的整理必将进入一个更高的良性循环高潮。

以下依时期陆续叙述。

敦煌学发轫期的研究工作，几乎都和目录工作有关。可以说是边编目录边做研究。这一点和别的学科很不相同。它是由前述敦煌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敦煌学从一产生就离不开目录和目录工作，以后的发展更是愈来愈要依靠目录。

敦煌学目录和敦煌学几乎同时产生。发轫期的敦煌学目录工作，则以编制某种草目和撰写个别卷子的提要、影印本题跋等为主。以下略依时代顺序与工作类型分述。

1907—1908年之间，那个伙同斯坦因(Stein, Aurel, 1862—1943)在敦煌莫高窟第17号窟(藏经洞)盗窃敦煌遗书的蒋孝琬，曾襄助斯坦因制作了一份约占他们劫夺的卷子数目三分之一的草目。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此目是英藏敦煌遗书的惟一目录，属于馆藏草目性质。更确切地说，那是一份不全的馆藏财产账。这个目录，可以勉强算是最早的敦煌遗书目录，也可勉强算是中国人所做的第一份敦煌遗书目录。

1908年从敦煌劫夺了大量敦煌遗书之后，伯希和(Pelliot, Paul, 1878—1945)在1909年夏季再次来到北京，目的是给河内的远东学院买书，并修补一些敦煌遗书卷子。他向罗振玉等人出示某些卷子，并应罗氏之请，赠与罗氏一批敦煌遗书照片。罗氏马上开始研究这些材料，并迅速写出三篇有连续性的不断补充的文章，那就是：

《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刊登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六卷十期。这是我国和世界上第一篇敦煌学研究的文章，其中载有所见的敦煌遗书12种的记录，还有31种书的一份书单。有的书名之下附有简单说明。

《莫高窟石室秘录》，刊登在《东方杂志》六卷十一、十二期。是前一篇文章的增补本。其中的书目部分记录敦煌遗书67种，新增约二分之一。

《鸣沙山石室秘录》，单行本，是前两文的增补本。国粹学报社出版。

罗氏此三文，可说是中国和世界上敦煌学目录及其目录工作的最早成果。从这一点上看，说罗氏是中国敦煌学目录工作的首创者中之一位，并不为过。

中国敦煌学目录的另一位首创者，馆藏目录的奠基人之一，应推李翊灼。1911年，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将学部移交的敦煌遗书8000余卷编成草目，这就是后来的《敦煌劫余录》的基础。李翊灼参与此事，将其通检一过，从中选出2000余卷，为它们各撰写了提要，这就是《敦煌劫余录》中大部分卷子提要的基础。李翊灼还细心辨识出160余种后世失传的佛经及其相关著述，编成《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一卷。1911年，最早发表在国粹学报社出版的《古学汇刊》第一集。此文虽短，却是一部功力甚深的考证和研究著作。它可称为敦煌学中第一部研究目录，影响深远。50年后，王重民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后记中评述说：“这一目录打开了

研究敦煌佛经的门径。随后,日本的佛教团体和佛学专家就在这一目录的指导意义下,利用伦敦、巴黎和日本国内收藏家所藏的敦煌遗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校订出了200种以上的古逸经和疑似经,在1924—1928年间编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第八十五卷内,给佛藏注入了新的资料,引起了佛学研究者极大的注意。”这是从目录学的运作角度做出的对李氏此文极恰当的评价。对李翊灼(1881—1952)的生平与他的全面学术成就,佛教以外的学术界,包括敦煌学界,一般说来都了解得不够,笔者愿意在这里略加介绍:李氏名证刚,字翊灼,以字行。江西省临川人。佛学大师杨仁山先生门下。主要著作有《西藏佛教史》,1929年正式由佛学书局出版。《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于凌波著,内地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于1995年正式出版)中有他的小传,请有兴趣的读者参看。

在敦煌学的发轫期,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以得到的国外藏卷照片为依据,撰写了若干提要性质的微型论文。可以按照其内容分成两种类型:

一、传统的校勘学目录学类型,可以刘师培为前驱和主要代表。1910年,刘氏以当时能看到的伯希和供应的少数材料为依据,在《国粹学报》第七卷(总编号75—82期)上,率先连续发表了《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篇。这是对传统的“四部书”残卷进行的最早的深入研究,以考订写卷年代、进行文字校勘、评定写卷价值等为主。极为精审扼要,可称典范之作。罗振玉在这方面极为努力,他在这一时期和以后写了60多篇以“跋”为主的文字,后来大都收入《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之中。缺点是常常在考订年代等问题上过于武断。

二、受到西方学术研究影响,从较新的角度进行研究的,首推王国维。王氏所写的名为“题跋”实属研究的文章,还有其他专题性质的研究文章,约有30多篇。他的研究范围较广,其《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开创了中国俗文学研究中敦煌俗文学研究的先河。20年代晚期,陈寅恪开始以其史学、文学、佛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独特风格与巨大实力,投入到敦煌学的研究中来,做出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在这一时期中,从事这类大体上属于目录、校勘性质的工作的,还有王仁俊、蒋斧等十来位学者。他们共同创造出这一时期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一大传统特色,并对直到现代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其中重要的题跋,后来都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王重民所编的《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敦煌卷子影印工作的起始期,主要应用石印的方法,出版了一批原卷影摹本。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录文本。代表性的如刘复所编《敦煌掇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5)。其中所录均为刘氏在法国目验原卷抄录而来,为我国学者亲赴海外阅卷开了先河。他以敏锐的眼光,从民俗学、俗文学等当时可称为新颖的角度,录出现代敦煌学中应归入变文、曲子词、佚诗、契约文书等大批材料,开拓了国内研究者的眼界,拓宽了敦煌学研究的道路。现在看来,这部书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有许多后来居上的各种各样的录文加注释的书代替了它。但它的历史功绩一定